

目 录

柏杨坪农民抗暴斗争始末·····	周梦生 (1)
忆周总理·····	陈天伟 (14)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遵义专区征兵实况·····	周梦生 (20)
抗日烽火·····	罗再启 (29)
我所了解的刘莘园先生·····	陈天伟 (53)
仁怀县建置沿革概述·····	徐文仲 (64)
忆土城土改工作会议·····	陈天伟 (85)
荒山红花·····	张宗禹 (89)
活捉匪首周天一·····	黄觉民 (99)
天生大顺国的复灭·····	袁泽光 (103)
仁怀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杜长根 (111)
仁怀县清代进士举人贡生简表·····	蔡克勤 (118)
解放前仁怀县警察机构概况·····	黎富培 (128)
茅台盐运及船业工会·····	王明星 (136)
赤水河·····	徐文仲 (141)
插图·····	王金华
封面题字·····	周梦生
封面摄影·····	梁新民
稿约·····	(155)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名单·····	(154)

柏杨坪农民抗暴斗争始末

周 梦 生

仁怀县二合乡所属的柏杨坪，周围方圆约三十华里，解放前住有农民三百多家，他们是聚族而居的，祖祖辈辈务农为本，兼营手工业。现在柏杨坪属合马区合马乡管辖，包括桃坪、大树子两个村。国民党统治时代，仁怀县政府，先后以清理官、庙、匪、绝产为由，利用权势，残酷的掠夺农民的地产。柏杨坪的农民，为了争取生存，被迫进行抗暴斗争，因而酿成了流血惨案。对这一惨案进行处理时，我亲身参与其事，现将其来龙去脉分述如下：

柏 杨 坪 概 况

仁怀县二合乡的柏杨坪，地处赤水河东岸，海拔四百多米，气候炎热。境内有一座山岗，分出四条支脉，大部面积是倾斜坡土，低洼地带是水田。土壤肥沃，一年两熟。当地农民，世代植棉为生，是仁怀县著名的产棉地区。棉花收后，家家户户都响起了机杼声，不论男女老少都会纺纱织布。所织的家机布，色泽光滑，结实耐用。染色有青有兰，经久而不褪色，价廉物美，远近驰名，畅销县内外，为仁怀县三大土特产（茅台酒、三元皮纸、二合家机布）之

一。

从明代以来，就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以邹、周、蓝、骆、涂、李、陈、刘八大姓为主，其他姓较少。由于他们勤耕苦织，才能勉强糊口。

来凤寺和永兴寺

来凤寺建在荣昌坝附近，地势较低，庙子修在小平坝的中间，占地不到两亩，一九四六年被烧了，现在村里的保管室，就建在庙基的旁边，庙后有古墓四座，据当地农民讲是和尚坟，但无碑迹可考。

永兴寺位于柏杨坪中心地区的山腰上，现属桃坪大队（村），解放后全部拆掉。该庙规模宏大，占地两亩多。经考证，两庙均建于明朝初年。拆永兴寺时，发现正殿正梁上写有“明万历年间培修”字样。这两间寺庙，一向归邹、周、骆、陈、蓝、涂、李、刘八大姓管理，因为他们的祖先集资兴建的，作为他们的家庙。招收和尚，要经八姓经管人决定，并立有规约，倘有违规的和尚，八姓经管人有权赶走，另外招收。和尚的生活费及香灯费用，统归八姓按户分担，庙上只有少量的土地作菜园。

第一次清理庙产

民国十八年（1929），仁怀县政府派委员去清理来凤、永兴两寺的庙产，发生争执。邹仕泰持证上省告状，省长周西成批示由“仁怀县政府查明具复”。经县政府指派刘厥

修、张月波、肖云光会同当地保董赵连三等负责清查。他们慎重办理，多方调查，逐户检验地契，认定检举不实，具实回报，经政府明确认定是八姓和其他姓的地产，还立碑记其事。随后政府又编查田亩，整理地籍，每户的土地均立了户，发有管业执照。据他们讲：在未编查田亩之前，八姓所有地产，立为李纯、邹庆会两个户头。每当纳粮时候，帮粮的户，按亩分该上多少就拿多少，这是我县在清末时，小户搭在大户里，完纳田赋的一种习惯。政府只照户头催征，不管内中的帮户有多少。

第二次清理庙产

一九四三年，江西南昌人熊腾云凭他哥哥当师长的关系，到仁怀县任县长。他带一帮江西老表上任后，为了中饱私囊，即以开辟地方财源，兴办公益事业为名，下令：组织“仁怀县地方公产清理委员会”。委员人选以所谓的地方士绅董联辉、赵守恒、胥泽生、孟临川、陈肇卿、祁显谟和政府中的本县人林光普、陈绪光等组成。由董联辉任主任，赵守恒当副主任。设置办事机构，制订工作计划，紧接着就分派委员下去，会同当地区、乡进行清理。被清理的主要项目，还是官、庙、匪、绝产。他们干的第一件不得人心的事，就是清理来凤寺、永兴寺的庙产。他们以阴险毒辣的手段，把来凤寺的尼姑僧明性（即陈和尚）弄进城去住在天后宫，教唆她指名控告八大姓霸占庙产。硬说柏杨坪来凤寺、永兴寺的很多庙产，被当地农民侵占了。还编造了一个荒唐的故事：说什么南明王朝在仁怀县境管辖的黎民镇，设立总

兵衙署，失败后，总兵衙署的两个幕僚，见大势已去，顺河而下，潜伏柏杨坪修庙，广置田产，借此栖身。来凤寺、永兴寺的庙产，就是他们置下的，并借此要把前一次清产的结论推翻，强迫农民承认侵占庙产。这种欺人之谈，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明初距南明有两百多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而且只要看一看各户的契约和管业执照，就会泾渭分明。可是当时的仁怀县政府，不以事实为依据，限令柏杨坪的农民，在十天之内，自动向政府投佃，逾期不办手续的，政府要收回土地。邹少彬、李文彬、蓝廷光等接到政府清理地方公产委员会的通知后，就把各家的契约和管业执照，带进城去，请求政府查验。因政府蓄意整农民，横不讲理，指责他们抗命，一口咬定他们霸占庙产，勒令他们向政府投佃，逾限要依法办理。

民国三十二年（1943），仁怀县清理地方公产委员会主任董联辉，副主任赵守恒，委员林光普、祁显谟、陈绪光等率武装保安队，前往柏杨坪清理庙产，走到二合树街上，遇到邹作清，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抓了。到了柏杨坪，又逮捕了邹少彬。这种作法，激起了当地农民的愤慨，被迫挺身抗暴。当即由农民邹文彬、邹少清、邹玉顺领头，邀集农民百余人，赤手空拳，奋不顾身，把被抓去的两个人夺回，从此闯下了大祸。

事情发生后，驻在来凤寺的保安队，好像一群疯狗，见人就咬。他们把农民蓝泽奎捉去关在寺内，农民们又去夺人。委员林光普，丧心病狂，竟下毒手，用手枪打伤了骆银三。十多天后因伤重死在寺内，他们草菅人命，销尸灭迹，真是无法无天。骆银三的族人骆华斋，去来凤寺探望，也被开枪

打断左手，花了不少的钱才医好，成为残废。刘少文、邹定猷、邹玉顺等，含冤赴遵义告状，遵义专署官官相护，偏听下级的呈报，真正受害者反而坐了一年多的牢。一九四四年冬，日本鬼子打到独山来了，才把邹玉顺等放回家。第二次清产，实际上是杀人夺产。紧接着这一群恶棍，就在血泊中开展了夺产工作，强迫农民向政府认租。他们还假惺惺地说什么投了佃，可以享有优惠条件，有永佃权。农民迫于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含泪办了投佃手续，任其宰割了。柏杨坪是产棉地区，棉花价格一向比谷价高，政府收租一反常规，不要粮食和法币，而要上棉花。首次收租，征收人员就凶相毕露，他们以征服者自居，对纳租农民毫不怜悯，尽量搜刮，百般刁难，一亩地的租，用两亩地的产都上不了。第二年秋收前，又加了一次租，他们以大秤收进，还要退皮、折耗，残酷地剥削农民。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写了飞黄（相当于传单）在来凤寺、永兴寺和合马、二合树街上张贴，为农民鸣不平，轰动了全县，政府曾派法警四处查拿写飞黄的人。由于年深月久，飞黄的全文已无可考，只是其中的开头几句，我还记得，录出以饷读者：

“熊令脏官，甚于盗匪。委员凶恶，无异虎狼。刮尽柏杨地皮，填不满贪官之欲壑；吸尽农民膏血，喂不饱委员之饥肠。嗟！嗟！哀我农民何事而遭此浩劫……”。

仅此寥寥数语，已把贪婪无厌的官吏，刻画得维妙维肖了。

围绕柏杨坪清产问题的斗争

仁怀县参议会，在尚未正式成立之前，竞选议员时就分为两派：一叫新派，一叫老派。新派成员中，绝大多数是中、青年知识分子。老派以旧官吏和地方上的所谓士绅为骨干。竞选结果，投靠政府的老派终于失败了，新派占了绝对优势。复选议长时，正副议长都是新派头头当选。在清产委员中是青一色的老派，新派拒绝参加。不论在会内和会外，都公开反对政府对柏杨坪的作法，积极支持柏杨坪农民，替他们出谋划策。由于夹杂了派性，问题就越来越复杂，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正当事态日趋恶化的时候，熊腾云调差了。为虎作伥的委员们，也没有那么嚣张了。陈怀仁接任县长，他是杨森的秘书，四川广安人，是个世故较深、经验丰富的老手。在他的任内，对于柏杨坪的真象，也有所了解。错误是前任干的，他照常收租，只是要缓和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极端。他信奉“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认为地方上的大士绅和在外边做过官的本地人，可以左右一切，只消把这些关系搞好，什么事都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在承办选举中，全力支持老派，瞧不起新派的中、青年人。但选举结果，出乎他的预料，是新派胜利了，从此双方结下了不可解的疙瘩，遇事掣肘，不久陈怀仁也就调差了。

国民党统治末期的抗兵抗粮斗争

陈怀仁任内，对柏杨坪问题，虽有缓和，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邹少彬、许明顺等看穿了政府的庐山真面目，认识到要想对抗，只有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才有力量。那时四川古蔺县的彭和乡，与二合乡隔赤水河相望，东岸是仁怀，西岸是古蔺，边区人民常相往来，互通声气，特别是逢赶场时，两县边民，拥挤不堪。彭和乡的农民，成立一个组织，叫做“党子”，首领王聚清，在地方上有号召能力。国民党的拉兵政策和征实政策，广大农民无不怨声载道。王聚清因势利导，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抗兵、抗粮、抗租的斗争。

柏杨坪逃往彭和乡依靠亲友的部份农民，也参加了彭和乡的“党子”。李少彬从彭和乡回到了柏杨坪，邀约有关人员开会，暗中发展“党子”，绝大多数精强力壮的农民，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党子”一无严密组织，二无信条，唯一目的就是抗兵、抗粮、抗税。他们非常齐心，一人有事，众人相帮；一家有警，众家相救，相互团结得很紧。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的一天，柏杨坪的农民，商量决定前往凤寺、营救被无理关押的蓝泽奎，一声号角吹响，农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的持枪，有的拿刀、有的执矛，连小孩也上阵呐喊助威，吓得主任董联辉丧魂落魄，逃出来凤寺，躲在农民陈海云家的小仓底下，事后他爬不出来，找人把仓撬开，才钻出来了。保警分队长贺本初和队兵，见势不妙，不敢抵抗，逃往茶房坳，农民们把蓝泽奎救出后，没有乱伤害人。委员和保安队回城了，柏杨坪暂时平

静。邹少彬等料到大祸即将临头，进一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规定信号，扼守要隘，轮流放哨，提防保安队反击。

董联辉和其他委员回城后，誇大事实，诬告柏杨坪的农民偷种鸦片烟，抗兵、抗粮、抗税，聚众造反，把柏杨坪说成“柏杨国”。并指控邹少彬是总司令，李文彬、刘少文是副司令，许明顺是参谋长。县政府还加油加醋，把问题说得很严重，电呈遵义专员公署和贵州省政府，恳祈“派兵剿办，以靖地方而维政令”云云。

派 员 调 查

一九四六年，李山崙由涪潭调任仁怀县长，李是贵州兴义县人，系何应钦先生的亲外甥，他到差后，主要就是执行省政府的剿办命令，省主席杨森，还指示遵义专员公署专员邵陵（四川人原任杨森的参谋长为人厚道）、保安副司令周德刚（云南人性情刚直）、保安大队长杨德儒（是杨森的亲堂孙），率领部队前往仁怀县，剿办“柏杨坪的农民叛乱”。邵陵对本案持谨慎态度，没有贸然行事，先派周德刚到县了解情况。周来县住贵州省银行茅台分行的经理郭永德处。郭同仁怀新派主要人有往来，因而知道柏杨坪的一些真实情况，便向周德刚作了介绍。周德刚进城，走访了仁怀县参议会副议长周梦生，他毫不隐讳，坦率地把案情向周德刚讲了，并劝周德刚从各方面作进一步调查，不要草率从事，把事情弄糟。周德刚决定亲自去柏杨坪实地调查，并邀请周梦生一道去。时间是仲夏，天气炎热，一行六人，有四人是便衣侍卫。由茅台坐下水船去合马，当夜找了赵守恒谈话，

请他找邹少彬、许明顺两家的亲戚来，由周梦生告诉他们：“专员公署派人同我一起来，准备去柏杨坪，叫邹少彬、许明顺在家等待，不要外出”。他们天刚亮，就到柏杨坪去通消息。早饭后，赵守恒和我们一共七人前去，在十一时到达。距来凤寺还有半里地，见山门外几十个农民，列队恭迎，很有礼貌，不是政府和委员所描绘的乱民。我们到正殿坐定，由赵守恒给他们作介绍。邹少彬和许明顺为代表，向周德刚面述夺产、征税、收租敲诈勒索，以及抓人，打死人，关押人的全过程。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中午在那里吃饭，还以羊酒款待我们，摆了十几桌，主客欢聚一堂。我们回合马时，顺便看了邹少彬、许明顺等五六家，茅屋居多，有好几家，连被子都没有一床好的，生活相当艰苦。穷成这样子，政府的官老爷、清产的委员们，竟无人性，硬要把一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地善良的农民，驱逐到死亡线上，真是残暴无比。我们从合马回来的次日，周德刚返专员公署汇报。

派兵剿办及所谓善后处理

一九四六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由周德刚、杨德儒率保安大队一营兵力，进入柏杨坪，先围搜许明顺和邹国才家。邹国才是私立崑山中学的学生，由正门走出，就被枪杀，身中七弹，是冲锋枪打的。邹少彬、李文彬等早已逃遁，得幸免于难。农历六月初三夜间，天下大雨，保安大队的便衣，去把许明顺抓住，押到韦家寨枪毙，李朝周的四岁女孩也被杀害。整个柏杨坪男人四处逃命，剩下老弱妇孺，负担徭役。

逃到他乡外地的，一直到解放后，才重返家园。

保安大队进剿的第三天，即农历的五月初二日，专员邵陵赶到仁怀县城，请参议会副议长周梦生，一道前往柏杨坪做安抚工作。到了柏杨坪的当天下午，邵陵复派人去三合土，把议长蔡维新也约来，在永兴寺正殿开会。邵陵说明他对本案的处理和善后措施，征求大家的意见：蔡维新、周梦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指出：县政府有意把事态扩大，造成流血惨案，责任不在上边，上边是受了蒙蔽，县长李山嵩要负主要责任。一些清理委员为虎作伥，从中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请专员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把本案真象弄明白，为屈死者昭雪。周德刚也把事先调查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在会上说了。最后邵陵表示：一定据实呈报省政府。

流血惨案发生后，街谈巷议，舆论哗然，给仁怀县政府以很大的压力。邵陵老练，社会经验丰富，他看出主力来自新派方面，一再请参议会多作解释，以维护地方政府的威信。周梦生和邵陵一道回到县城，适值贵州省政府通知仁怀县参议会，去一名议长，出席贵州省政府召开的军政联合会议。驻会议员一致推周梦生出席，并委托周在会议期间，把柏杨坪发生的流血惨案，向省党部、省参议会负责人反映，请求伸张正义。周还利用空隙时间，拜望了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国桢，省参议会议长平少璜先生，把柏杨坪事件向他们作了详尽的陈述，要求他们向杨森主席转达仁怀民意，释放在押的无辜农民，召回流亡外地的农民，抚恤死者的家属。平少璜先生听了后，气愤地说：“你们县里竟干出这样的事，我去和杨主席讲，立即派员复查，把问题弄清楚。”

剿办之后，仁怀县政府，在柏杨坪设立“子惠村”（子

惠是杨森的号)，村办公处设在永兴寺，由何振声任村长，保安大队驻防。他们大兴徭役，强制农民修碉筑路，把柏杨坪的树木砍伐殆尽。以永兴寺为中心，修了三条简易公路：由永兴寺至二合的，叫“君甫路”（邵陵又名君甫）、由永兴寺至三合的叫“德刚路”。由永兴寺到来凤寺的叫“山崧路”。强迫为他们的血腥罪行树碑立传。保安大队驻到八月初才撤走，由仁怀保警队填防。

不久，何荫微（四川涪陵人）接任县长，他到差后，将“子惠村”改为柏杨坪特区，派何伯修任区长，旋因贪污案，被法院判刑管押，又改派赵守恒接任区长，不久又由王觉非当区长。在这一段时间，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要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终日啼饥号寒，一个个鸠形鹄面，惨不忍睹。

借 刀 杀 人

柏杨坪农民抗暴斗争，虽被镇压下去了，可是老派人士，犹以为未足，进一步借题，发挥妄想嫁祸于新派。他们伪造民意，私刻私章，以大批的所谓公民，联名向重庆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指名控告蔡维新、周梦生为首的新派议员二十余人是奸党，是柏杨坪“党子”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请求上峰彻查严办。贵州省政府于一九四七年秋，派省政府视察员朱品珊来仁怀调查。朱和我县刘莘园先生是同学同事，他们的交情很深，因此朱先去仁怀鲁班场桃佳寨，看望赋闲在家的老友刘莘园先生。刘知道朱是带着使命来的，即向朱解释，所谓“奸党”是“莫须有”的，地方上的派性斗争到的

确是事实。刘莘园先生陪同朱品珊一道进城，由蔡维新、周梦生出面邀请在城的新、老派议员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欢迎朱视察员和刘莘园先生。在座谈会上，周梦生把柏杨坪广大农民抗暴的始末，作了详尽的介绍。朱在城里住了六天，还听取县政府和各方的意见，回省复命。未几，杨森调渝任市长，谷正伦回黔主政，此案才不了了之。当时若无刘莘园先生仗义直言，揭露事实的真象，更不知有多少人要戴上“奸党”的帽子，而遭到杀身之祸。

血 债 血 来 还

柏杨坪农民的抗暴斗争，自一九四三年起，至解放时止，持续了七年之久，先后被打死了农民四人，打伤致残七人。被拆毁了房子一幢，查封房子两幢（罚款一千四百元才启了封）。在外地长期关押了六人，关在本县监牢的，时关时放，为数更多。三百多家农民，竟遭如此荼毒，至今思之，犹令人痛心疾首。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仁怀县解放了，柏杨坪的三百余户农民，才从黑暗走向光明，昭雪了沉冤，成为真正的主人。人民政府依法清算和惩治了制造血案的有关人员，血债终于用血来还了。区长王觉非罪恶累累，潜逃金沙，被逮捕归案，仁怀县人民法院，在一九五一年秋于二合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祸首僧明性，于一九五〇年冬，由仁怀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其他村长、主任、副主任、委员，除陈肇卿、祁显谟而外，在一九五一年清匪反霸时，都先后伏法。凡牵涉到柏杨坪农民案件有关的人员，该杀的杀了，该判刑

的也判刑了，七年沉冤，由人民政府为他们昭雪了。当年领导农民抗暴斗争的成员，虎口余生，幸存下来的邹少彬同志，一九五〇年夏，被选为仁怀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大会时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仁怀县第一届委员会召开时，经县委提名，协商决定邹少彬同志为县政协委员。柏杨坪的人民，也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忆周总理

陈天伟

一九六〇年五、六月间，我先后在贵阳、北京，四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距今虽已二十五年，但当时见到总理的情景，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人难忘。

一九六〇年五月下旬，省里召开文教群英会。当时我在中共仁怀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文教卫生是党委宣传部门分管的主要业务。我带领全县文教卫生先进单位的代表和先进个人十余人，出席了省里召开的这次群英会。会议期间，适逢“五一”国际劳动节。贵阳市人民载歌载舞，兴高采烈地隆重庆祝这一节日。在这时，周总理来到了山城贵阳，和全市人民一道欢度“五一”节日。

周总理来贵阳以前，在陈毅同志的陪同下，正在东南亚的越南、缅甸等六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开展外交活动。因中途回国稍事休息，于是陈毅同志去昆明，周总理来贵阳，分别在两地参加庆祝“五一”节的活动。

“五一”节的前一天，遵义地区带队参加省文教群英会的邱宗毅同志（遵义地区文教局局长）口头通知我和段启荣同志（中共绥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卫生工作先进县的代表），准备第二天，参加“五一”观礼。并悄悄的说了一句，周总理已经来到贵阳。这个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高

兴万分。我暗暗地想，这回可有机会，见到周总理了。当天夜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五一”节清晨，天刚麻麻亮，我就起床了。按照大会的安排，我和段启荣等三位同志，于上午八时乘坐一辆吉普车，奔赴贵阳南厂军区广场。一路上，排得整整齐齐，穿着节日盛装的干部、居民、学生、农民队伍，都朝着南厂方向前进。当我们到达南厂广场时，先到的队伍，已经站得整整齐齐，不少干部、军警在四面八方维持秩序。我们登上主席检阅台左侧，临时架设的可容百人以上观礼台。因为没有固定坐位，我便拉着段启荣同志，在离主席台较近的右侧倚栏伫立。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广场上彩旗如林，挤满了十万以上的群众，场面十分壮观。像我这样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干部，真是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这时，我和大家一样，都在不断的看着手表，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针指到十点的时候，几辆小轿车，在主席台右侧，嘎、嘎、嘎的几声停住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顿时传来了主席台前少先队员清脆的欢呼声。这时，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模等省、市委的其他负责同志，陪同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健步地登上主席台。广场上，暴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这次和总理一道来贵阳的有邓颖超同志、张闻天同志。大会开始后，少先队员代表登上主席台向总理敬献了一束鲜花，然后站在总理的前面。大会由伍嘉模同志作了庆祝“五一”的讲话。周总理站在主席台上，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不断环视着广场上的人群。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正是他的心和广大群众紧密的连系在一起吗？总理有时低下头，用他温暖的手，抚摸

着站在面前的少先队员的头额，在他丰满的面庞上，微微的露出笑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表示他希望我们祖国的新生一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党的阳光的孕育下，茁壮成长，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的这种希望，不正是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祖国的未来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吗？在长达将近两个小时活动中，周总理站在主席台上，没有移动一步，直到离开会场，毫无倦意。当时我们都为总理的身体健康而感到万分高兴。邓颖超同志在大会进行中，走到主席台下，举起照像机，拍摄镜头，以便留下他对贵阳人民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的情景。

五月二日早晨，仍然是遵义地区带队的邱宗毅同志，通知我和段启荣二人，到省人委大礼堂听周总理的报告。早上八点，我们按时前往，当走到人委大礼堂前面广场时，省直机关处以上的干部约二、三百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不一会便有人招呼，叫大家背着人委大礼堂的正面，排列成弧形的三排，前一排坐在靠背椅上，后两排站在高凳子上。前一排的正中，留着十多个空位。显而易见，这是准备摄影的场面。大家意识到周总理和省委的负责同志，要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人们静静的坐着、站着，鸦雀无声。九点钟左右，省委领导同志陪同周总理来到了广场，总理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正中的坐位。在行进中，他的目光，扫视着我们，并不断地挥手致意。坐下后，当摄影师还没有打招呼以前，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凝视着总理……。总理迎面而来，他的坐位和我站的地位又很近，丰姿伟貌，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摄影后，大家都走进礼堂，静候总理向我们作报告。可惜不多